

美国 情报失误研究

张长军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美国情报失误研究

张长军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情报失误研究/张长军著.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 - 80137 - 945 - 4

I . 美… II . 张… III . 情报机构—活动—研究—
美国 IV .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470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次: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8.75

印次:2006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12 千字

印数:2500—5500 册

书号:ISBN 7 - 80137 - 945 - 4/E·636

定价:15.00 元

序

张晓军

情报活动与战争如影随形，一起诞生，一起发展，历史一样久远；然而，相比之下，对情报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进行系统的探索与理性的思考，则开始较晚，专门成果的出现则更晚。这种实践的久远与理论研究的短暂，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个中缘由，除了人们的认识能力需要一个渐次提高的过程之外。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保密。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股批判现状、要求改革的社会思潮席卷美国，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批著名的号称“掏粪者”的带动下，不时有学者、离职、退役的情报官和知名记者对情报界的失误、丑闻予以揭露。那股强劲的“揭丑”风，吹拂到今天，依旧余波未歇。加之美国的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批判性思维在美国异常活跃，学者从一开始就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军事情报失误的根源并力求探寻不同的救治和预防良方。其结果，是涉足情报失误方面的研究者及其成果；数量众多，蔚为大观，成为美国情报研究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

研究这些著作，无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启

发我们的思维。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此还相当陌生。

张长军的《美国情报失误研究》，其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均来源于美国近年来公开发行的研究著述或在互联网上公布的原始英文资料，资料翔实可信，内容丰富充实，相当客观地反映了美国学者关于情报失误研究的状况的真实面貌。他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美国学者所提及的纷繁复杂的情报失误原因进行了剖析，分析客观准确，评价客观允当。

本书的作者张长军，治学刻苦严谨；好读书，爱思考，肯用功；勤于搜求资料，乐于探讨疑难问题，力求慎思明辨形成独立判断。他的从学经历是，本科阶段学习英文，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研究军事理论。撰著本书以前，他已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还被评为全军优秀硕士论文。本书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凝结了他数年来的学术积淀。

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的读后感是，这是一部好书、一部有价值的书、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书。

2005 年 10 月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情报失误研究在美国	(11)
第一节 关于情报失误的争论	(12)
第二节 评判失误的标尺	(24)
第三节 美国情报失误研究的现状	(35)
第四节 美国情报失误研究的方法	(44)
第二章 体制论——情报的组织制度与失误	(55)
第一节 21世纪的美国情报界	(55)
第二节 对美国模式的历史考查	(60)
第三节 体制改革的尝试	(80)
第四节 体制改革的前景	(88)
第三章 主体论——情报的生产者与失误	(96)
第一节 情报的特殊性与情报失误	(96)
第二节 情报分析失误的类型	(99)
第三节 情报分析失误的原因	(102)
第四节 情报分析失误的根源	(104)
第五节 情报分析失误的典型表现	(116)
第六节 克服情报分析失误的尝试	(129)
第四章 用户论——情报的消费者与失误	(148)
第一节 谁该为情报失误负责	(148)

第二节 情报用户造成情报失误的原因探析	(154)
第三节 情报用户与情报失误的论争	(163)
第五章 反情报、隐蔽行动与情报失误	(181)
第一节 反情报与情报失误	(181)
第二节 隐蔽行动与情报失误	(186)
第六章 情报失误案例剖析	(193)
第一节 解读“情报门”背后的纷争	(193)
第二节 美国情报界的悖论 ——另一种视角看 CIA 高官辞职	(201)
第三节 情报界的考验 ——预防的局限	(209)
第四节 情报分析与道德困境	(223)
第五节 美国各界眼中的印度核试验情报失误	(232)
余 论	(239)
附 录	(244)
A: 解析美国情报评估文本	(244)
B: 相关术语	(261)
C: 美国军事情报单位缩略语	(265)
D: 参考文献	(267)
后 记	(273)

试图创建宏大的情报理论的努力都失败了。

——沃尔特·拉奎尔

引　　言

一

自然科学的术语排斥目的论，“成功”、“失败”、“无能”、“能干”这类词顶多起虚构的作用。^①然而，它们却是社会科学的正规用法。因为人是社会科学的对象，人天生就能追求有意识的目的。

情报机构存在的一切理由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知”，即千方百计地获悉所需情况。可以说，从诞生之日起，情报机构就围绕着“求知”展开着特殊的斗争。套用先贤的话，“先知”、“全知”、“尽知”是所有情报机构为之奋斗的至高目标。然而，情报机构书写的不全是辉煌与成就，它们的历史记录中也充斥着失误与败笔。只不过与其他机构相比，情报部门的失误长久以来少有人问津。这主要是因为“秘密”也是情报机构最大的成就。于是，出现了一种两难现象：情报机构的成功往往不为公众所知，而其失败行为一旦曝光，几乎无一例外地产生强烈的反响。或许，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说明，公众了解到的情报失误还不多，否则的话，人们会因为见惯不怪而漠然置之。

^① [法]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6月，第104页。

然而，究竟何为情报失误？情报机构的失误有多少？情报机构如何会失误？情报机构能否不失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不可能给出确切的答案并找到解决的良方。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归结到一点，则在于对“情报”这一最基本的术语的理解依然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仅以美国为例，无论是官方的法令规定还是学者们的个人见解，都未能就此达成共识。当然了，这也不足为奇，即便是许多成熟学科，也未必已就本领域的基本概念达成统一、清晰的共识，更何况情报学这门新兴学科呢？

于是，探讨“情报失误”本身即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那么为何又独独选择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众所周知，情报机构是国家统治机器的有机成分，它们必然要带有所在国的政治与文化特色。反之，一国的政治氛围、文化特征等也会影响到公众、学者对情报机构的态度。如此一来，在有些国家，反映情报失误的著述、讨论就相对要多一些，而在另一些国家，几乎找不到同类的著述，更不用说举行专门的听证会就情报失误问题展开大讨论了。

仅以美国情报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中央情报局为例：中央情报局大学、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院每年都要专门出版印行情报失误案例，以便该局情报处的分析专家们通过研究这些案例吸取教训，了解不确定性和突然性可能会给情报工作带来的挑战。^①这种“事后解剖”法几乎已经成为美国情报界的传统。不仅情报界，国会情报委员会、关心情报运作状况的学术界和民间团体也纷纷加入到与情报失误相关的各种类型的

^① Jack Davis: Improving CIA Analytic Performance: Strategic Warning. Paper2, September 2002. The Sherman Kent Center for Intelligence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s: Volume 1, Number 1.

研讨活动之中。

其实，非独美国，整个西方世界似乎都更乐于、也敢于查找自己的失误。^① 比较而言，我们显然更喜欢正面的说教和积极的鼓励。这或许是所谓的“喜鹊文化”与“乌鸦文化”在情报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已。但是，不管中西方在情报失误研究领域存在着多么悬殊的差异，学术界和情报界却都渴望找到改进的途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并避免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出现的大量探讨情报失误的著述无非是从相反的角度探索改进的方法，其中美国人的表现最为突出。美国大量的学者，其中不乏顶尖级的学者之所以热衷于发掘情报机构的失误，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声讨情报，而是想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并设法开出相应的医治药方。

这就是我们研究美国人探讨情报失误问题的意义所在。尽管从情报实践、情报机构的设置还是情报活动的范畴等方面看，美国和我们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有些甚至完全不同。但是，“求知”这一情报活动的根本宗旨是相同的，而关于“求知”的机理也是大体相通的。此外，还有一点亦是毋庸置疑的，即社会科学研究都难以避免偏见，研究人员常常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看问题。虽然书写的对象是美国情报失误，但

^① 仅举一例西方近代的史实：“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 1886 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即将在 1870 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组织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毛奇重视部署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但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地受到严重打击，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选译自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225.

梳理阅读相关材料时，印入脑海的每每是自己当年在情报单位工作的场景。

不可否认，这种先入为主会影响材料取舍的客观。但社会科学研究又有谁能在描述与分析之时保持一种纯粹的冷眼姿态呢？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扫描了公元 1500 年迄今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过度扩张”是导致大国从权力顶端衰落的关键因素；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通览了公元 1792 年迄今的世界历史之后认为，国际政治即大国政治，由于大国注定要进攻他国，所以大国政治必然以悲剧的形式收场，而且永远如此，没有例外；中国学者袁应时对满清王朝的衰亡史情有独钟，苦研多年之后发现，大国兴衰的经验归结起来，即个人是否拥有自由，制度能否自我更新。很显然，前两人是在替美国如何持续称霸建言献策，后者则试图回答中国如何实现强盛这一百年话题。

二

美国的军人和学者是最勇于剖析自身不足的，他们喜欢把自己置于失败者的地位：失败之后反复研究，不断吸取教训、适时加以改进；胜利之后不是忙于总结经验，首先要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进行深刻检讨。这似乎已成了美军的惯例与特点，是美军经历了失败之后做出的明智选择。可以说，海湾战争足以拂去笼罩在美军头顶的阴霾，但美国军人很少以夸耀的口吻提到海湾战争，研究海湾战争更多的是寻找暴露出的问题和改革的切入点。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告诫国人：

“沙漠风暴行动是与理想的敌人进行的一场理想的战争……我们获得了理想的联盟、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战场。我们在总结战争经验时应该格外当心……如果我们允许骄傲自满和

自鸣得意来替代有益的怀疑，替代避免把下一场战争只看作这场战争之重演的努力，那么我们既不明智，也不慎重。我们必须记住，在未来的危机中，我们也许没有6个月的时间去做好准备。”^①

一批退役的美国将军们这样评价海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

“海湾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表现出了情报上典型的局限性。尽管美国可以利用几乎全部为对付苏联而创设的情报资源，但即使运用了大量的现场资源，美国也不能查明伊拉克的全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力量；不能发现机动导弹发射架。在有些情况下，我们只能‘看见’己方前进部队前面数千米的情况；美国误击过我们认为应该攻击、但实际上里面有平民的目标。在有些情况下，只有可靠的人工情报渠道，才能提供必要的情报，例如，了解深层地下设施中的情况所需的情报。”^②

再看看最近发生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留给布什总统的不仅是胜利和荣耀，更有棘手的“情报门”，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仗都打赢了，还有什么可追究的？但正是这种穷追猛打的审慎节制，才是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的原因。

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都不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双脚踩在大地上时才能打败所有的对手，一旦将他架空，他便毫无还手之力了。失败自然应该吸取教训，胜利亦不忘深刻检讨！二百多年前，托克威尔在旅美期间便惊异地发现：

“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

^① 勒希民主编：《当代国外军事名著精选》，上下卷，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10月，第328页。

^② [美]哈伦·厄尔曼等著：《震慑论》，滕建群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50页。

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①

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无可争议的“硬实力”之外，具有以反复纠错、不断修复等能力为代表的“软实力”才是美国不断发展壮大乃至独步天下、藐视群雄的霸权底气的根本。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这种优越的自我修复能力，是它保持强大的更深刻的内涵。美国之所以当仁不让谋求主导性霸权优势，一方面是因为它有强悍的综合力量作后盾，其他诸强与美国不处在同一个等级，用亨廷顿的话说，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在力量的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方面都具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可见的超强实力只是维系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方面，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方面，一系列巧妙的制度安排、润物细无声的软实力、卓越的纠错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资本，才是美国霸权长期不衰的根本原因。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各个历史时期权力资源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在拿破仑朝代的欧洲，农业和人口是最关键的权力资源；在俾斯麦时代的欧洲，铁路和工业制造力是国家制胜的关键；到了 19 世纪末，决定大国竞争的最重要的权力资源是海军实力。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军事力量作用的下降。在这种状况下，以“吸引”而不是“强迫”为标志的“软实力”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保罗·肯尼迪曾骄傲地指出，美国以约占 GDP3% 的军费水平维持着如此突出的国际地

^①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257 页。

位，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应当归功于美国的“软力量”。^①

三

对未来的世界忧心忡忡，惟恐美国重蹈历史上大国衰亡的覆辙，几乎成了美国学者必须探讨的题目。在美国学者群中，不乏汉斯·摩根索、保罗·肯尼迪、约翰·米尔斯海默之流的“悲观主义者”。在情报研究领域，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大量著述的涌现无疑是美利坚民族沉重的“危机感”的明证。

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可悲的，但一个危机感过重的民族是可怕的。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在欣赏其“危机意识”的同时也要警惕这种意识的负面影响。无疑，美利坚民族的危机感是其不断进取、不断革新的强大动力源之一。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危机感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变成其“寻找敌人”、

^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小约瑟夫·奈在他2002年出版的新书《美国强权的悖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不能一意孤行》中，集中讨论了两种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他的分析中，硬实力是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实力，这种实力可以强迫其他国家遵循一种特殊的行动方针。相比之下，软实力——文化的力量、榜样的力量、理念和理想的力量，更能潜移默化地起作用。其实所谓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它国而非威胁它们或付钱给它们来达到目的的能力。它是以美国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为基础的。奈认为，诱惑总是比胁迫更有效，美国的许多价值观念都极具诱惑力，比如民主、人权和个人机遇。后来，美国外交学会政策问题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又提出了所谓的“粘性实力”说。该理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已经使得美国一直处在全球秩序的顶峰。但是这个霸权国家不能单单靠枪炮和好莱坞电影生活。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是“粘性实力”，正在把其他国家吸引到美国的体系中来，然后使它们陷入其中。无论“软”也好、“粘”也罢，其实质大同小异。

干涉别国事务甚至采取先发制人式进攻行为的借口与理由。历史已多次证明，浓重的危机意识曾驱使着这个国家试图在各个领域都追求“绝对优势”，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

以敌为师，方能克敌制胜。我们不仅要善于引进美军的先进技术，借鉴其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理念，更应该学习美军这种惯于自我剖析的精神与勇气。历史证明，一个勇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是强大的，一支具有自我解剖精神的军队是不可小视的。

军事情报失误往往酿成严重后果。翻开历史，此种教训俯拾皆是。以往赢得胜利的经验，绝不能成为开启下一次胜利之门的钥匙；而昔日的失败和想象中可能的失败所提供的借鉴，或许能为下次战争奠定胜利的基石。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在其不朽的著作中早就写道：“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而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① 美国一名军人在其所著的《军事情报大失误》中这样写道：“情报可谓一种预警机制，它使我们避免未来的伤悲”^②。为了不重蹈覆辙，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不应忽视历史上的失误。必须揭露过去的失败、问题和错误，因为它们对于任何组织都会持续产生影响，而且时常举足轻重。轻视过去、沉溺于辉煌无助于当下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未来的不负责任。假使能够从既往的失误中获得教益，最好不过；即便不能，至少可以提请人们注意到问题的存在。

信息时代，情报活动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情报搜集技术也随之进行了革新，情报处理方式也在变革之

^① 毛元佑、黄朴民：《武经七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② Colonel John Hughes - Wilson, *Military Intelligence Blunders.*,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nc, 1999, p352.

中。然而，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情报活动与外界环境的发展比较来看，发动战争一方与预防战争一方（攻防双方）在行动准备与侦察分析（能力与意图）之间的大致平衡尚未被打破。须知，没有哪一种变化是孤立发生的，比如伴随着信息海量的出现，情报机构已开始尝试并逐步实现情报搜集与分析的自动化；伴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军事、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重要，军事情报分析人员的队伍构成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不论如何变化，也不管变化如何迅速，关键的问题是，能否摆脱思维定势，迅速适应新的时空变化。诚如富勒所云：

“首先我们必须牢记，人总是人，他的心不会时过境迁。其次，还必须牢记，战争手段确实在变，因此，人类的智力必须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敏锐、活跃，不为传统所束缚；我们必须自我反省，批判我们之原先批判；我们必须进行试验，进行探索。”^①

四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千万不能因为美国人写了大量的反映情报失误的著述、多次举行了与情报失误相关的听证会，便简单地把著述、听证会的数量和次数视作反映情报机构能力高下的指针。我们毫无理由据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情报界的表现糟糕透顶；同样道理，很少探讨情报问题、闭口不谈情报失误的国家，其情报机构的表现未必就好得多。恰恰相反，美国的历史，特别是其扩张史和战争史都有力地证明，从建国之初直至今日，美国情报界的表现堪称世界一流。今天，当我们有机

^① 转引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研究中心编著：《国际危机管理概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3月。

会阅读美国政府新近解密的部分《国家情报评估》、《特别国家情报评估》、《总统每日简报》等美国情报界的最高级别的产品时，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个超级大国的情报界精英荟萃，表现超俗。仅以反映我国情况的一些评估报告为例，它们不仅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时的基本形势，而且对未来的发展态势也作出了基本准确的分析预测。比如，ORE 77-48号《中共控制全中国的能力》（1948年12月10日）、国家特别情报评估第100-12-58号《台湾海峡危机可能的发展态势》（1958年10月28日）、国家特别情报评估第13-4-64号《共产党中国即将进行核爆炸的可能性》（中央情报局1964年8月26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8月）等。^①

① 内容详见附录。